



为“生命·实践”而思

——“生命·实践”教育研究专题报告会论文集

WEI SHENGMING
SHIJIAN ERSI

◎ 李政涛 主编

将正在共同创建的教育学学派称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标示出我们关于教育学的理论，以“生命·实践”作为基因式核心概念为特征。这是我们在构建学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选择，它不仅是学派建设基点的选择，也是学派理论理想的确立，还是学派命脉的聚焦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自己的这一选择称作教育学学术研究中“回到原点的思考”。

——叶澜

1518270

此书为叶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十二五”重大项目“基础教育变革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研究”（课题编号：11JJD880034）研究成果。



CS1674241

G40

0917



为“生命·实践”而思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专题报告会论文集

WEI SHENGMING
SHIJIAN ERSI

◎ 主 编 李政涛

◎ 副主编 卜玉华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重庆师大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生命·实践”而思：“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专题报告会论文集 / 李政涛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495-0863-1

I. 为… II. 李… III. 生命哲学—教学研究—中小学—学术会议—文集 IV. G633.2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90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168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9 字数：335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 000册 定价：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派”与“汇”

(代序)

李政涛

自从作为中国本土之教育学派的“生命·实践”教育学问世以来,先后在前行之途中建置了“成果回望”、“立场确立”、“基因探究”、“命脉挖掘”等路标,学派的基本取向、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等核心性、根基性内涵等已初建成形,且为诸多学界同人所瞩目,反响和影响均与日俱增。其中,今年已经从教 50 周年的学派创始人叶澜先生所撰的《“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一文,获得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除此之外,学派同人相关学术成果的转载率和引用率也在上升。当然,学派的发展与成型依然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深化研究、形成系统,是所有同道者殷殷以求的。为此,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和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生命·实践”教育学研讨会,投寄会议论文者踊跃,本书即是该研讨会论文的选集。

受会议组织者的委托,我承担了本书的主要编选工作。在编校过程中,我感悟着因严肃认真的“研讨”而得到的多种收获。

收获之一:“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内涵和价值的理解趋向丰富与深入。

书中既有对当下“生命·实践”教育学特点的整体把握,对学派已有研究的梳理和展望,也有对“生命·实践”教育学“中国元素”的集中提炼,这实际上是对构成学派的文化传统“命脉”的进一步探究。作者们的理解和思考,在共享学派核心概念与观点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个体性的视阈和感悟。例如,在“自然生命”与“社会实践”的对举中,以“自然生命”的视角来解读对“生命·实践”的理解;又如,以“新基础教育”中的感悟为依据,延伸到

“新基础教育”对“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奠基价值；再如，对“事理”关系这一有关教育研究性质定位的思考，进行了类型化、层次化的探究等。这些浸润了作者体悟的思考，无疑来自个体生命的独特，是“体悟之思”、“体知之学”的产物，彰显了“生命·实践”教育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统特征和学脉气象的承接与转化。

收获之二：“生命·实践”教育学逐渐内化为一种“视角”和“眼光”。

学派之间的差异，表面上是观点的差异，实质是视角和眼光的差异。本书的许多论文已经不满足于引用或借用“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核心概念和观念来论证观点、表达自身，而是转而以学派的视角和眼光探究某一具体问题；或者重构道德的生命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生命·实践”学校德育体系；或者在班级建设理论的建构中渗透和内化“教育学立场”这一学派基石，进而反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系统重建；或者透析学校文化的“生命·实践”意蕴，探究学派视角下的教师发展、教育实践研究方式及其对自我发展的震撼与生发。

收获之三：“生命·实践”教育学增添了新的参照系和理论元素。

任何学派都并非形成一个自我隔绝的真空环境，它需要将自身置于多种参照系的对比研磨中寻求独特的发展路径。本书提供的参照系，既有学科层面的，如以比较教育学作为参照系，展现教育学发展的一种独特空间；也有概念层面的，如以德国教育学的传统概念“教化”为参照系，在“教化”的历史考察及其与“生命”和“实践”等学派核心概念的牵连性举证、内生性分析中，展现了德国教育学的学术传统对“生命·实践”教育学发展的可能影响。在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内涵更新与话语转换的分析中，论及“生命·实践”教育学。此外，还有作者从“人论”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其对“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构建的根基性价值，再次展现了学派回到原点、回到源初的思考方式，印证了海德格尔的“深信”：“我深信，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精神作品不是扎根于源初的原生性之中的。”从学派诞生之初，它就深深地扎根于“人”、“生命”、“实践”等这样一些构成教育学理论“原点性”的问题之中。

以上不同视角、不同深度、内外立场的多元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相关研究中的“生命·实践”状态。思想意义上的“生命·实践”，试图形成的实践成果是开辟出一条新路来。迄今为止的“生命·实践”教育学，展现的已经不只是某种“概念”、“问题”和“观点”，而是一种新的“道路”，“道”与“路”始终相伴相随——对“生命·实践”教育学之“道”的孜孜求索，就是尝试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开路”和“筑路”。所谓“探讨”，就是用探讨来“探”出学派特有的“路”来，并询问学派思想的生存之道，展现、强化学派

理论的实践能力与生存能力。

1947年,潘光旦先生为费孝通先生所著《生育制度》所作序言中,解读了“派”和“汇”的区分和关联:“派与汇,派指思想的分歧,汇指思想的会聚;派是分析,汇是综合;派是家数,汇是集成。”在他看来,人类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派”到“汇”的发展过程,先有“派”,再有“汇”,前者相对单纯,后者相对复杂:“天下凡属有发展的过程的事物似乎都取一个梭子形的公式,起初单纯,中段复杂,末了又归于一种新的单纯;或起初笼统,中段分化,末了又归于一种新的笼统,我们叫它做综合。”在潘先生那里,“汇”是“派”的综合和结果,他解决的是“汇”从何而来的问题。然而,也可以反向探问:“派”又从何而来?答曰:“派”的源头同样来自“汇”。任何思想和观念的形成过程并不单纯,这是一个类似酿酒的过程:四面八方的原料,包括已有的各种学科、视角、概念、观点、方法等,汇聚于思想者的大脑这个酒坛里,最终酿成独特风味口感的“琼浆玉液”,因而才有了赫尔巴特之“酒”、杜威之“酒”等各种学派创设人及其学派之“酒”。近期出版的《杜威全集》(早期著作)中展示出杜威思想的源头之“汇”的渊深,令人感慨不已。同样的“汇”也体现在“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始人叶澜先生的思想之中,从其已有的著述可以看出,仅是就“生命”、“实践”这两个概念的解读,若追根溯源,是对生物学、社会学、脑科学、复杂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中国儒家、不同流派的教育学等多种原料的汇聚、融通和转化而成的。“汇”不是各自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转化性创造与创造性转化的综合融通。基于各种“派”的思想资源的汇聚越丰富,转化越有创造性,“派”的思想就越有根基,越加厚实,越富有力量。如同潘光旦先生所言:“由派分而求汇合,唯有从汇合中求得的知是真知,更从而发生的力是实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实践”教育学体现了“派”与“汇”的双向交融,它是在东西方文化思想之汇、不同教育学学派之汇、不同学科的学派之汇、教育学思想与相关学科思想之汇等各种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体知、不同证悟之汇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独特”,所有的“独特”都是综合性、整体性的独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生命·实践”教育学必将在不断的“新汇”中走出新的单纯、新的独特。

本书就是学派目前发展阶段的各种“新汇”的集中表达,虽然并非所有的声音都清晰悦耳,并非所有的观点都已成共识,但所有的思想都是在为学派未来的发展酝酿和铺垫而生,正如今日之“派”需要通过已往之“汇”来实现,今日之“汇”也在为明日之“派”提供新的可能。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枬教授,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李苑青副总裁,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孙杰远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卜玉华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云星也参与了本书的编校工作,他们把各自的力量汇聚于本书,在此深表谢意。

目 录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特点、贡献和展望	侯怀银	1
浅析“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中国元素	王 枬 王昊宁	10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实践基石	李政涛	30
论叶澜基于生命立场的教育思想	刘 德 华	59
教育学的“事理研究”: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思想之解读	卜玉华	67
我所理解的“生命·实践”教育学	刘良华	82
在“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中的领悟	吴黛舒	104
道德的生命内涵与“生命·实践”学校德育体系的构建	易连云	113
班级建设理论建构呼唤教育学立场	李家成	123
试析学校文化中的“生命·实践”意蕴	李伟胜	143

“生命本位”研究路向下的教师自我更新式发展	张向众	163
主动深度介入:转型期教育实践研究的新方式	伍红林	180
“新基础教育”研究带给我的文化震撼与生发	李伟	191
在“危机”中寻找“转机”——试析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内涵更新与话语转换	杨小微	198
从比较教育学到教育学的若干思考	黄志成 陈进	220
当代教育学重建的本土资源:儒家教化精神及其价值	黄书光	231
生命、实践和教育学学科身份的寻求:“教化”的历史考察	彭正梅	242
教育学中的人论及其与理论构建的关系初探	庞庆举	261
人的“可塑性”与教育——从赫尔巴特到本纳	孙元涛	287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特点、贡献和展望

侯怀银^①

教育学是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中国的教育学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有学无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建中国本土教育学派成为中国教育学建设和发展的目标。“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适应了中国教育学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为了推进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有必要对“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特点、贡献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1

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特点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伊始,主要是以“新基础教育”的探索性研究为支撑开始踏上探索之路的,此阶段开始的标志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实验学校作为“新基础教育”试验基地的确立和叶澜两篇文章的发表。1994年10月,《教育研究》发表了叶澜教授的《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这可以说是叶澜“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宣言,她从对时代精神的分析入手,阐述了以“新人形象”为核心的教育理想。1997年9月,她在《教育研究》又发表了《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其中她从“生命”视角对教学活动进行了探究。这两篇文章构筑了“新基础教育”的两个核心,即时代和生命。在探索性阶段,课题组成员在叶澜的带领下,主要集中从三个层面对实践产生影响,一是实现以生命观为核心的教育观念上的转换;二是改变学校日常的教学生活和班级生活,实现实践层面上的转换;三是转变师生在学校的生存方式,实现师生

^① 侯怀银,博士,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生命在生存意义上的转换。总之,可用四个“还给”概括其全部内容,即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叶澜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及推广性、发展性研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该课题是在1994~1999年“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延续性课题,于1999年5月启动,2004年5月通过鉴定结题。在这个时期,“新基础教育”的研究与发展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推向了又一新阶段,其以叶澜1999年提出的“学校转型性变革”这一命题为标志。探索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变革和班级建设两大方面,这一阶段研究将学校变革的主题集中和提升到“学校转型性变革和创建新型学校”上,突出了变革的性质是“转型”,不是“修补”或“改进”,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机制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它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和动力内化等。这些理论认识都来自“新基础教育”的实地研究和试验。它们为试验学校实现转型提供了整体性认识框架,且研究弥补了探索阶段批判性分析力度不强、重建性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化不足等方面。此外,这一阶段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重建性研究,多了一份探索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本身转型的自觉,并把“研究性变革实践”作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载体和新型研究方式,改革更加深入、彻底,综合性也更强。在理论发展的同时,参与试验的学校也在不断增加,已扩展到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的50多所学校,试验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研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包括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试验的学校和教师,也包括某些区域推广地区的行政领导与教研员。

2004年,“新基础教育”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阶段。在原有研究基础之上,进而选择了10多所学校参与创建“新基础教育”精品学校,这不仅是深化学校变革的研究,而且是“新基础教育”成型阶段开始的标志。这一阶段旨在聚焦新型学校的创建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典型化研究促进学校整体性的新形态建设,从总体上把扎根到学校实践中的研究稳步推进,在质和量的不同状态与水平的统一中,以扎实、深入的方式,有创意地走当代中国学校转型变革之新路。

就在该课题即将结题的2004年2月,叶澜在《教育研究》上明确提出了“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这一明确目标。正是在以“理论与实践双向建构”为目标的“新基础教育”的持续深入研究中,“生命·实践”

教育学派也在逐步成型。这集中反映在叶澜主编的《“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中。该论丛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2007年开始出版,现已出版四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教育领域内,首次以推进中国教育学研究、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派为宗旨的学术性论丛。

第一辑《回望》,相对集中地收集和撰写了一批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核心概念和生成过程相关的论文,对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思想路径作了全面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一系列与“生命·实践”教育学创生相关的回顾、思考、论述、体悟和问题,凝聚着和透射出当代教育研究者为中国教育学重建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立场》是叶澜主编的继第一辑《回望》之后的第二部《“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它集中体现了研究者对教育学学科立场问题的反思与探索,具有突出的理论探索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正如该书后记所言,“生命·实践”教育学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土壤中生长出的新芽,它将成为新世纪中国教育学创建中的一个流派,以它自己的扎实、智慧、真诚去酿造教育学的新酒;它将是鲜活的、生长的,但不是肤浅的、盲目的;它是当代的、创造的,但不是割断历史的、自命不凡的。研究者试图通过“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生,在世纪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这声音将揭示平凡教育事业所蕴涵着的丰富与伟大,蕴涵着与人类最为基础的存在——生命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蕴涵着对创造、智慧和发展的呼唤以及对健康人性、幸福人生、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第三辑——《基因》的主题,书名已将其点明。收入本辑的论文围绕教育学理论基因式核心概念的探究,开展了广泛的、不同视角的讨论,表达了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多维的理解。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第四辑——《命脉》以叶澜的文章开篇,继续深化以“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学当代重建基因式内核及其命脉的论述,既在延续《基因》之脉,又在建构《命脉》的总体形象与内在之神。第二部分聚焦教育学发展的实践命脉,从教育学重建式发展、教学理论重建、班级建设理论重建等领域,试图呈现实践命脉之独特,进而进入对教育研究、教学改革,乃至听说评课范式转换的讨论,进一步扎深教育学发展的实践根基。第三部分聚集中国传统文化,从对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教育学发展之关系入手,讨论了知识论命脉、草根底色、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创新等问题。第四部分的内核是“学术传统”,从中国学术转型、中国教育学的学术发展之脉络的意义上展开,向我们提供了对于中国教育学发展如何扎根于学术传统的自觉思考。第五部分是对教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反思,

再一次促使我们审视中国教育学发展所需要植根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命脉。第六部分为教育学之“命脉”聚焦后的再次开放,既有对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系统反思,从而为教育学发展提供参照,也有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读;既有对“课程”与“教学”的词源考古,又有对当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田野研究。

从方法论层面看,“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该学派不仅对教育实践进行研究,而且进一步深入开展对教育学史的研究,以理清教育学发展中呈现出的教育学本身和其发展的基本问题,以及当今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可能的空间。

第二,重新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及其当代研究,关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及核心观念、思想方法的演变,以寻找新的能够把握教育本真状态与本真问题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哲学智慧之海中汲取营养,深入探究“生命”、“实践”之本意。

第三,拾起因政治批判而被扭曲、鄙视且陌生化到不太相识的中国古代经典,以发现被我们轻易抛弃的古代思想和传统之中存在着的中华民族借以生存、发展的顽强精神力量与智慧,意识到当代中国教育学的重建,除了认识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外,还必须回归自己已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家园,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国近代教育学因“引进”而断裂的学术命脉,在当代中国教育学重建中重新连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重新流淌在当代教育学的生命成长之中。

总之,“生命·实践”教育学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土壤中生长出的新芽,并因此成为新世纪中国教育学创建中的一个流派。

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主要贡献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探索和总结“新基础教育”在当代学校转型性变革研究,尤其是在学校管理、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新文化创建方面的独特经验和创新理论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教育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机制、中国教育学派的话语系统和语言方式、中国教育学派与世界其他已有教育学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具体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和机制以及中国教育理论对世界教育理论的可能贡献和贡献方式。该学

派从教育和教育学两大层面主要作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贡献。

(一)确立生命关怀价值取向,关注教育生命价值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生命价值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学生发展与学生管理过程中的“生命关怀”的价值取向。以培养主动健康发展的生命个体为目标,无论是在教学管理还是班级管理过程中,都体现出对每一个学生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关爱。

第二,在教师发展与教师管理过程中,致力于挖掘、提升和展现教师在教育实践与思考中的生命价值。长期以来,教师的角色被定位为知识的传递者,各种教育要求的执行者、操作者,而不是思考者与创造者。教育研究与学校改革试验不仅关注学生,而且关注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通过教育实践创生化的变革,使教师体验到教师职业的尊严与欢乐,体验到教育是一种充满了智慧挑战的工作。

第三,对校长生命价值的彰显。学校转型性变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是新型学校的主要特征。在新型学校中,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和高度智慧的职业,校长自身的生命价值也得到了挖掘、体现和彰显。

(二)聚焦生命原点的学校改革和发展,突出“教学管理”与“班级管理”

在教学管理中,从生命的、高度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探索了其多重、丰富的含义。课堂教学应被看做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中有意义的构成部分,课堂教学对参与者具有个体生命价值;课堂教学的目标应全面体现培养目标,促进学生生命多方面的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认识方面的发展;要进入课堂教学过程的探究。

与以往进行的各种基础教育改革不同的是,学校教育改革必须把“班级建设与管理”放在与“课堂教学管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班级生活在学生生命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学校要让班级成为孩子生命成长的舞台,成为展现其生命价值的舞台。为此,要把班级还给学生,通过岗位轮换、互动式评价等形式,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班级建设中来。

(三) 定格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促使制度安排成为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枢纽

如何把理念形态的教育转化为实践形态的教育,并使二者相融共生,这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一直关注的问题。有了新理念,并不必然具有与之相应的行为,这仿佛一个人的意识与观念已经急急起身了,手脚却还犹豫不决地拖在后面。要解决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化”,即创造具体的学校制度,才能有效地体现和转化“新基础教育”的理念,才能把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师生具体的日常化行为。校长和教师不仅需要“教育智慧”,也需要“制度智慧”。“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学校制度体系,包括听课评课制度、教学制度、班级建设制度、学习研讨制度、教师发展制度、评价制度等。

(四) 重建学校文化,实现以“生命·实践”为底蕴的学校文化转型

与以往的学校文化建设不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学校文化建设不再局限于把学校文化建设作为一种门面、装饰和点缀,也不再满足于把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突破口。在它视野中的学校文化是生命发展与创造、社会文化发展与创造的创生性舞台。具体而言,这既是一种促进人的生命主动展现、主动发展的文化,又是以改造人的生存方式为己任的文化;既是通过文化的改造转型来完成学校转型的文化,又是通过学校文化创新来实现教育创新的文化;既是与蕴涵着时代精神的社会文化主动回应,并力求按社会文化的要求,主动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创建中,去建构超越现实的学校文化,又是致力于提升和拓展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教育文化的内涵和品质的新型学校文化。

(五) 重视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转换和突破,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滋养、双向建构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研究中,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论中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目标与手段、价值与事实、人文性与科学性等多对范畴内部的割裂和对立的基本逻辑,舍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努力探索使两极积极沟通、有效交互的复杂思维方式的运用和行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研究方法论上的转换和突破。尤其是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学派通过不同主体在研究中努力实现不同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自我转换与统一,使得不同主体间的理论与实践实现转换与统一,进而实现研究任

务和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相互生成。

教育界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当理论与实践双方相互抱怨的时候,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学“上不入天、下不入地”,理论和实践还处在混沌状态,理论的核心不清楚,如何指导实践也很模糊,上下没分化,故理论的研究要“上天”,但它的“脸”要向下,要面对现实世界;教育实践的研究要深深地扎根到中国的教育实践的土壤里去,要“入地”,但是在往上长。一个往下看,一个往上长,到一定程度才能结合。这个过程是双方相互滋养、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在天上的研究人员与在地上的实践人员在相互渗透与交流中形成共同创造、不断反思、尝试重建的过程,从而生成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变革实践,即“研究性变革实践”的新型教育研究方式。

(六)改变教育学期长期以来的依附性,促使教育学向原创性迈进

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我国教育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个主要倾向——引进和移植。引进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记号,先是从日本,然后是从美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从苏联引进。移植主要表现为从相关学科中“移植”,包括移植问题、移植研究方法、移植研究和理论的逻辑。先是用自然科学的立场、技术的立场来研究教育问题,近年来持社会学、文化学立场的又渐渐多起来,缺少的恰恰是最重要的教育学自己的研究立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一改这两种依附倾向,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获得滋养,“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构建”一方面改变和提升了当代中国教育实践的面貌和品质,达到了成事、成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重建之路,在变革的时代里,在生命基础上,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具有中国气派的、原创性的教育学。

三、“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发展展望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既扎根于时代,扎根于教育学科,扎根于教育实践,又扎根于叶澜及其团队执著、求索的精神而生长出来的一株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生机勃勃的教育学派新苗。“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未来发展必须更加注重以下六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聚焦学校到关注学校外部相关社会的转变

目前看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关注的范围还主要聚焦在学校,研究对象还主要是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在进一步强化研究教育对社会作用

的基础上,对学校外部相关社会关注较少,例如对家长的关注。家长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来,但他们对“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理念的接受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直接决定着整个学校转型性变革的实施成效。因此,对学校外部相关社会大环境的研究也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从重理论创造到重实践程序的转变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教育创新理论源于教育实践,又高于教育实践,最终需要回归到教育实践中从而观照教育实践。立足于新基础教育改革,“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不断生成、创造新基础教育理论和学校教育改革实践研究成果,而今后应更注重将先进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将理论成果转变为可操作的实践程序。“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实践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这样“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才能不断更新,保持先进,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弥补了以往教育学对教育生命价值的关注和教育实践整体性的深入研究,其对教育生命性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使每个身处教育世界中的生命都焕发出生命活力,使生命的能量通过教育得到增殖、提升和扩展。这些理论已被许多人熟知和欢迎,也在被许多教育研究者和教育者所践行,其浓浓的生命底蕴,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不仅会被人们更熟知,而且其提倡的理论会更深入人心。“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试验学校虽然在不同阶段先后走入上海市、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湖南省等地,但这还只是中国众多地区中的一部分,随着其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实践的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除基础教育外,如何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领域拓展,也需要紧密关注。

(三)从重常理发现到重真理揭示的转变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理论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拓展。“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所进行的“新基础教育”试验虽已完成了从探索、发展到成型的一系列研究阶段,但其毕竟只是一项试验,只是在部分地区进行。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不甚平衡的大国,东、中、西部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一方面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提出了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机遇,在进一步的推广中,面对不同的环境和背景,理论会不断补充、修改和丰富。如何进一步形成特有的概念、命题和范畴,这将是理论上着力探索的课题。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学问。任何研究都是一个循